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公款出国旅游问题是被夸大的吗



公款出国团组下降近一半,人次减少45%以上,费用节省37.6%,达到16.31亿元。看这组数据,可谓亦喜亦忧。压缩如此高的比例,作为治理的成效实在可喜,但作为过去缺乏治理的材料,则是可忧。另外一个比较让人疑惑的事情是:节省37.6%是16.31亿元,也就是说,前几年公款出国游的费用每年不超过45亿元,这与大家的一般感受有不小差距,那么,公款出国游的问题,是被夸大的吗?

遏制公款出国旅游,有了一组数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2009年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节约16.31亿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近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了49%、45.5%和37.6%。(2月10日中新网)

真是好数据。节约了16亿,好。出国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下降很大,好。

还记得去年初,各地陆续宣布要压缩行政开支,“三公消费”首当其冲,在过去三年平均数基础上,公务员出国费用压缩20%、公务用车费用压缩15%、公务招待费用压缩10%。按说,现在这三项支出的账都已经有了,但现在还只有出国旅游报了账,另外两项

的账,什么时候才能报出来呢?

公款出国团组下降近一半,人次减少45%以上,费用节省37.6%。看这组数据,可谓亦喜亦忧。压缩如此高的比例,作为治理的成效实在可喜,但作为过去缺乏治理的材料,则是可忧,竟然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员、团组和费用,是可以压缩的。这样,我们既要祝贺治理公款出国旅游的成效,又应该追问一下公款出国旅游从前是怎么审批的。

不过,这终究算是一个让人不免要笑逐颜开的账。由这些数据来反推,可知公款出国旅游的情况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严重。每年公款出国费用有多少,没有过权威数据,这回有了,节约16.31亿元,下降比例是37.6%。反过来推算一下,

近三年平均公款出国旅游费用是多少?我算术不好,具体数字说不出,应该不到45亿吧。

传说中,每年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出国,每项的支出都是上千亿乃至几千亿元。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说传言不可相信,而且往往坏事呢?公款出国旅游,原来其实是连45亿元都不到的,去年又节约16亿,就不到30亿啦。

所以,节约了16亿元,虽然值得庆贺,更加值得庆贺的,却是这节约的钱占到了公款出国费用总数的37.6%。这相当于为公款出国问题辟了谣,传言上千亿或者几千亿的公款出国费用,实在是太离谱了。同志们,问题没那么严重嘛。

公款吃喝、公款用车,情况又怎么样呢?同样是没有权威数据的,同样有各种上千亿乃至几千亿的传说。我想,这两样也应该有数据,证明不仅可以立即使支出下降近4成,而且能让人知道,吃喝与用车的公款支出其实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严重。

如此一来,“三公消费”,就都可以有个权威数据了。而且铁的数据将证明“三公消费”虽然反应强烈,传说很多,但落实下来,都属于被严重夸大的问题。什么叫出人意料?公布公款

出国旅游治理成效的数据,就是一个例子。我能够说节约了16亿的数据不准吗,我能够说费用下降了37.6%的数据不准吗?当然不能,这是权威数据。那么,我就不能不相信近三年公款出国费用平均只有不到45亿元。

社会经验和一般感受是怎样的呢?我想,公布的数据以及根据数据所作的推算,可能与很多人的感觉大有出入。然而,感觉终究是感觉,你不能把感觉作为一种“权威材料”,不能把感觉作为“铁的证据”,而数字可以,公布数字的机关可以。所以,你只能采信权威机关公布的数字,而必须否定自己的感觉。

只是,另一方面来想,如果权威机关的数据与人们的日常感觉和经验发生了巨大的背离,那么数据和权威机关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难道只要说一声,“我们是拿数据说话的,数据都是经过了核实的”,就没有问题了?

新闻说,治理公款出国已经建立“长效机制”,今年还要“取得更大的成效”。但是,怎样使“公款出国费用不到45亿元,还又节约了16亿元”被人们接受,并且成为“可感的事实”,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还需要费些脑筋吧。(作者系著名杂文家)

》相关评论

2009年10月末,总额接近300亿元的广州市本级财政预算案全部公开上网。有人提出,公众普遍关心的公款出国、公款招待、公车消费等“三公消费”就没有单列出来,是不敢单列?还是预算编制本身的问题?对此,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说:预算科目的设置是国家有关法律

出国游节省16亿怎么算出来的?

法规统一规定的,不是一个地方想怎么编制就怎么编。在目前的预算编制科目里,没有公车消费、公款招待、出国费用这些条目,这些是跟着具体项目走的,那么,这个公款出国的费用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基本上是下面报上去的吧? 2009年全年全国党政干部

因公出国(境)到底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相信也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的。但既然预防腐败局专门提到了治理公款出国旅游的成绩,那么,“公款出国旅游前三年平均不到45亿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就必须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如果是根据下面报上来的数

据简单统计而成,那么,就不能排除数据弄虚作假的可能。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即便统计年鉴的数据不够权威,不到45亿和3000亿,这里的差距也太大了吧。(刘宇)

》新华时评

丰田汽车和毒奶粉患的是一种病

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业界“大佬”深陷质量危机;在国内,问题奶粉在事隔一年之后重新流入市场,乳制品行业刚刚艰难树起来的信任又面临考验。看似毫无瓜葛的两起事件,实际都是企业急功近利,忽视质量和安全的例子,“欲速则不达”的古训又一次警示身处激烈竞争中的企业。近年来,丰田逐步超越福特、大众和通用,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其扩张速度令人称奇。然而,迅速提高的市场份额背后

也潜伏着放松质量把关的隐患。据称,丰田曾不断压缩零部件采购成本,简化零部件设计开发和实证试验阶段。最终,一个并没有多少高科技含量的零部件却让这个有着70多年历史的“金字招牌”蒙上阴影。国内问题奶粉重现也在重复着同样的教训。从去年开始,中国乳制品行业逐步走出信任危机,但是个别企业急于收复失去的市场份额,在此前奶牛存栏量下降过多难以恢复,奶源供不应求、价格上涨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使用

当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进行生产,到头来不仅身败名裂,而且拖累到整个行业。在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甚至残酷的今天,许多企业选择“做大象”,以为身躯庞大就无人能敌。丰田汽车和中国乳业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市场急剧扩张的情况下,抛开行业发展规律,把原本用来打基础的投入用于“跑马圈地”,就成为一些企业“讨巧”的选择。但是,生产规模可以急速扩大,汽车研发实验和奶源平稳建

设却不可能一蹴而就。欲速则不达,没有打下牢固的基础,楼越高面临的倾覆危险就越大。无论企业从表面上看规模有多大、发展有多快,欠账总是要还的,而且这种“还”对企业可能就是致命一击。因此,“做大象”倒不如“学大象”,如大象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成功者必须耐得住寂寞,企业发展也决不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要树百年品牌,就必须把质量始终作为企业的生命。 新华社记者 朱立毅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浑身是假”的副书记是如何炼成的



一个除了性别浑身是假的人,居然能在官场一路亨通,坐上团市委副书记的位置。如果不是争遗产被人举报,她还能继续混迹下去。这样一出匪夷所思的“官场现形记”说明:官员选任机制有着多么巨大的漏洞,官员信息不透明,将会酿成怎样的恶果。

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被人举报冒充别人女儿争夺遗产,举报人还称,王亚丽曾为了晋升团市委副书记,把年龄改小了5岁。2月3日,石家庄市纪委书记证实,专案组已开始查办王亚丽涉嫌身份、档案造假,并非非法侵占他人财产一案。(2月10日《京华时报》) 这一新闻,堪称传奇。虽说英雄不问出身,但在官员选拔制

度面前,真实的出身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而在王亚丽身上,居然“除了性别是真的,其它一切都是假的”,这样的人,居然还是堂堂的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如果不是王副书记财迷心窍,趟了争夺富商亿万遗产的浑水,动了别人的奶酪,遭人举报露了馅,恐怕还会一路高升。这真是一个荒唐至极的“官场现形记”,难怪连中纪委有关人员都

感叹,“这新闻所未闻”呢。已经有网友将王副书记的发达路线图描述出来了:出身草根的她,因攀上富商的关系之后,斜刺里杀出,迅速成为一颗政治新星。至于她是如何得到富商的鼎力相助?暂且存疑,她用什么样的资源和富商进行交换,并得到热情回报,我们也不必多想。但她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纵横官场的,却不令人想。官场上森严的壁垒,是在王亚丽什么武器攻击之下,变得形同虚设的?这种选人用人机制上的疑问,专案组应该在调查结束后给大家一个清楚交代,否则的话,浑身是假的团市委副书记,并不足以成为一只推动制度改良的麻雀。王亚丽摇身一变杀入官场,手

段并不高明,真相并不复杂,如果相关的信息透明,她也就没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和神通。王亚丽将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那些给她一路放行的人,是作恶的帮凶,却还在各自的位置上安然无恙,如果不把他们揪出来,还会出现下一个王亚丽,或许等到下一次,性别都可能不再是真的了。因此,有必要通过倒查的方式逐一检索,让该负责的人负起责来,通过严厉的问责制来给此事善后。一个王亚丽倒下了,但王亚丽们生存的空间还在,严把官员选任制度关口,扩大官员信息公开力度,让官员更透明地接受民众监督,是拒绝王亚丽们潜身官场的唯一可靠途径。(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

》异论锋生

算了吧,别盯着“猪坚强”了

“猪坚强”自出名后一直受关注,除了在博物馆朝九晚五“上班走秀”外,胖了还有私人医生制定“特殊减肥法”。近日,两岁半的“猪坚强”生病拉肚子已不能上班。(2月10日《华西都市报》) 汶川地震已经过去近两年了,那些曾经的抗震救灾英雄,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可有一头猪,却依然坚挺在我们的视线之中,更为甚者,这头猪患了感冒或是拉了肚子,都能成为一条新闻。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不得一个正常的“猪坚强”了——它的生老病死、它的多愁善感,都可以跟琼瑶阿姨的电视剧拼一拼了。

猪永远是猪,不是神,也不是人,这头猪本身就不该被赋予太多的正面意义。一头矫情的猪背后必然存在矫情的人。据了解,这头猪在博物馆里每天都享受总统般的待遇。如果这头猪真的会思考、会写字,在网上开博、在报上开专栏恐怕也是早晚的事了。就如同某超女在获得了冠军之后,在世界杯期间开专栏评球一样让人作呕。真是那样的话,“猪坚强”的博文中定有《做猪难,做一头名猪更难》的感慨吧。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中,有个不起眼的小品《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小品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虚拟的“贾君鹏”出名之后,真实社会中无数个叫贾君鹏的人遭到骚扰,还往往被一些记者扣上“见义勇为”、“勇斗歹徒”之类的帽子。有时候甚至不惜让北京的贾君鹏跑到南方去做媒体报道过的好人好事。其实,这两种事例中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太善于制造正义的噱头了,为了噱头,甚至可能本末倒置。(王传涛)

》公民发言

高校卖地还债 地权迷局无可回避

许多地方早就在卖地偿债了,可只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成为“高校卖地还债”的标本。

(2月10日《新华网》)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土地是政府划拨的,学校无权改变土地使用性质,若土地使用性质不能改为商业用地,那么这块地是不值钱的。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权力在政府手中,但政府要先把地收回才能改为商业用地高价卖出,政府收地意味着土地使用权已归政府,卖地后所得的出让金亦归政府,政府又该以什么样的名义转到学校账上,拿来还债?

这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操作中,政府先把地收回拍卖,然后把所得资金一部分以“倾斜支持政策”返给学校。但理清其中关系后,分明看到这根本不是高校卖地,而是政府卖地替高校还债,学校只是背了个名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高校欠债该谁还?如果说高校超过2000亿的负债要政府动用公共资金来还,每个纳税人的背脊都会一阵发凉。如果答案相反的话,那么所谓的“高校卖地还债”就是违法行为,公共资金没有理由拿去给高校填窟窿。

为了避免高校债务谁还的问题,于是称这是“高校卖地还债”,高校欠的债高校卖地来还,就没有争议了。但既然高校能“卖地还债”,那么就等于承认划拨土地的增值归高校私有,这是更可怕的“开闸”——高校可以卖地还债,那么所有拥有划拨土地的单位是不是也可以卖地还债?卖地发福利也应该可以吧!

土地的增值应该归谁所有,成了“高校卖地还债”中绕不过去的问题,归政府的话,政府怎么能拿卖地钱替高校还债;归学校吧,那当初学校打着教育名义征地,看起来就像一场财富的掠夺。学校现在可以坐拥土地增值,那么农民也会想:如果地不被收,我们也可以“卖地致富”。(范大中)